

中华文化

与

中国未来

◎朱高正 著

ZHONGHUA WENHUAYU
ZHONGGUO WEILAI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文化

朱高正 著

与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未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朱高正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

ISBN 7-5617-3820-X

I. 中... II. 朱... III. 文化-中国-文集
IV. 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0398 号

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

著 者 朱高正

责任编辑 姜汉椿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 //www. ecnupress.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一次

印 数 6 000

书 号 ISBN 7-5617-3820-X/K · 240

定 价 16.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余敦康

值此世纪之交,朱高正先生的《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一书结集出版,可以说是一件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大事。朱高正先生是台湾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对康德哲学与《周易》颇有研究,多年来一直不遗余力为推动台湾民主化与中国现代化而努力,并且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一九〇七—二〇〇〇)对朱高正先生的从政与为学做了高度的评价,在为其《纳约自牖》(一九九七)一书所做的序中曾说:“朱高正向来以启蒙哲学家自诩,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想要了解朱高正这个人,就一定要看他的书;关心国家前途的人,也非要看他的书不可。”“笔者深信他的思想一定会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产生极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以继承五四精神为职志的启蒙哲学家,究竟朱高正先生的思想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我在认真拜读了他这部大作以后,得到了两点明确的认识:就其对中华文化的回顾而言,可以归结为“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就其对中国未来的展望而言,可以归结为如何理性地处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这是贯穿于《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全书的两大主题,也是朱高正先生长期关注运思的关键所在。这两大主题的互为体用的辩证关系,从总体上构成了他的启蒙哲学思想的全部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朱高正先生对这两大主题的阐述,虽然是立足于启蒙哲学的理念,有着坚实的学理依据,但主要却是紧密联系百余年来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以及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所做的一种战略性思考,因而读起来备感

亲切,引人入胜。

实际上,关于传统中国如何向现代转型的问题,自晚清以来,就已经成为关心国家前途的菁英阶层热烈讨论的焦点问题,到了五四时期,发展为高潮,直到今天,仍然是思想界争论的热门话题。由于这场讨论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逼迫下进行的,缺乏舒缓从容的操作空间,往往是焦虑浮躁,以激情的冲动取代理性的思考,仓促应对,进退失据。虽然在讨论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派别,相互攻驳,看起来热闹非凡,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化”和“什么是传统”这两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并没有上升为理性的自觉,始终摆脱不了独断论与怀疑论的谬误。诚如朱高正先生所言,近百年来,我国菁英阶层的文化意识一直徘徊于“西化”与“虚无”之间。一方面将西方过度美化与理想化,仿佛西方即是我们未来的理想,另一方面则与传统割裂,茫然无根,文化主体意识荡然无存。针对这种五四以来普遍存在于我国当代菁英阶层的文化意识,朱高正先生站在启蒙哲学的理念高度,提出纲领性的批判,热切地呼唤再来一次思想上的启蒙。

五四时期,中国的菁英阶层普遍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而对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哲学思潮的了解则是停留于极为表面肤浅的层次,虽然如此,但是为了救亡图存,急功近利,却在中国如何走西化道路的问题上,分别做出了两种独断论的选择:一种以胡适为代表,选择了走欧美式的自由主义的道路;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选择了走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进程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思潮,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成为主流思想,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对自由主义大加讨伐,除恶务尽,终于酿成了文革浩劫,使得中国现代化的事业严重受挫。直到邓小平复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才扭转了这种局面,重新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也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关于如何全面地总结中国经历了百年之久并且付出了沉重代价接受

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所累积的经验教训,使之达到理性的自觉,以便清醒地迎接未来严峻的挑战,是所有站在时代前列从事思考的人士必须认真探讨的跨世纪的大课题。朱高正先生根据自己长期的思考,为这个课题的解答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照朱高正先生看来,所谓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其实质性的涵义在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从学理的层面看,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自由,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平等,此二者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如果片面地强调自由,势必侵犯平等;反之,如果片面地强调平等,势必扼杀自由。这种关系有如经济上的效率与公平,不能因效率而危害公平,也不能因公平而牺牲效率,只有使两者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寻求动态的平衡,才能使经济的运作趋于合理化。对于源于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现代化概念,也应作如是观。尽管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所预设的核心理念互不相同,各自建构了以“主义”命名的思想体系,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独断性,并且以对立的面貌出现,但是对立中却有互动的一面,彼此抗争同时也是相互的对话,作为自由主义者不能不倾心听取社会主义者的诉求,作为社会主义者也不能不重视自由理念的价值。比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平等的理念为基石,但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未来组建而成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而为了完整地把握现代化的概念,绝不能以偏概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遗憾的是,五四时期我国菁英阶层恰恰是产生了这种认识论上的谬误,或者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欧美的自由主义化,或者简单地等同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化,看不到两者之间的既对立又互动的辩证关系,由此而付出了百年来沉重的历史代价,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作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模式,无论是自由主义或是社会主义,都是可行性的选择。二十世纪初时,苏联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模式,西欧北美选择了自由主义的模式,这两种不同的选择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分别创造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东欧和东亚的一些国家走苏联人的路,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模式,西欧北美则仍然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模式,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两大阵营对立并峙的冷战格局,互争雄长,进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斗争。到了二十世纪末时,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结束,许多人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失败,历史已经为这场战争画下了圆满的句号。朱高正先生则力排众议,指出这种历史巨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失误。斯大林执政期间,政治上专制独裁,经济上排斥市场经济,大力推行计划经济,文化思想上实行严密控制,对异端无情打击,其总的特征是对自由主义采取一刀两断的措施,完全拒绝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必要的补充。正是由于这种极端片面而又顽固僵化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以骨牌效应纷纷解体。至于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垂而不死,仍然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也并不单纯意味着自由主义的胜利,而主要是由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法国的左右两党的折衷共治以及美国的新政,因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虽然以自由主义为标榜,实际上却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间透过绵密交错的对峙和对话的一种互动的发展。

就中国在二十世纪在现代化道路上所走过的坎坷历程以及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政策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而言,业已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使得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在祖国大陆上趋于和解、并行前进。因此,朱高正先生认为,为免于重蹈覆辙,避开今后可能出现的误区与陷阱,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我们应站在既有的基础上,总结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记取教训,萃取其进步合理成分。绝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简单的二分法来片面地对待自由主义,也不能使社会主义沦为僵化的教条。唯有深入探索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对立到互动、互补的历程,才能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性,也才可能确切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义。

根据这种战略性的思考,朱高正先生进一步讨论了重建文化主体意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所谓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所拥有的历史传统为其所独有的,并对此历史传统不断做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予以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从而超越传统、创新传统。唯有建立文化主体意识才能培养出有自信、有自尊的现代化国民,也唯有现代化的国民才能建立现代化的国家。这种文化主体意识是一个民族的“内在的我性”,蕴含于由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之中。追求现代化不能脱离传统,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能够完成现代化的。因而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掘其固有的精神资源,重建一种鲜活的、适应于现代化需要的文化主体意识,对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跨世纪的宏伟实践来说,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既然如此,那么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究竟有哪些精神资源值得我们格外珍惜、认真发掘呢?朱高正先生对这个课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其所表现出的思路,总的来说,是从展望未来的角度来回顾过去,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大于纯学术性的严密细致的研究视野,务求经世致用,目的在于为解决当前现实的困境提供文化上的决策依据。朱高正先生认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两种现代化的思潮固然是由西方输入的舶来品,但是作为价值理想的追求和思想的成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却有着极为深厚的精神资源。比如孔子的大同思想与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皆以均平为原则,就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晚清的严复大力介绍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同时也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发掘自由主义的资源,谋求两者的契合会通。他在翻译穆勒的名著《群己权界论》的凡例中指出:自由主义的真谛是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则《大学》絮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吾观韩退之《伯夷颂》,美其特立独行,虽天下非之不顾,王介甫亦谓至贤必不徇流俗,此亦可谓自由之至者矣。至朱晦翁谓虽

孔子之言,亦须明白讨个是非,则尤为卓荦峻伟之言。谁谓吾学界中,无言论自由乎?”实际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为追求现代化而输入西方思潮,其思想底蕴,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都是立足于中国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尽管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的口号盛极一时,但是传统仍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无法脱离。当前中国学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根据未来的展望来重新认识传统,上升为理性的自觉,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使传统由因袭的重担转化为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由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西欧北美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那种僵化顽固的社会主义,而是追求平等与自由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良性互动,因而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可循,而只能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凭借中国人的传统智慧,由中国人自己来创造出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是一个充满风险、歧路横生的艰难选择,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了解决这个时代课题,朱高正先生根据他对《周易》哲学的深入研究,从博大精深的易理中抽绎出一套“太极思维”,认为这就是中国人传统智慧的结晶,可以为合理地处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既对立又互动的关系提供全方位的理性支撑。所谓“太极”,宋代哲学家张载把它界定为“一物而两体”。“两体”即指阴阳、刚柔相互对立之二分。“一物”即指此二分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分中有合,对立中蕴含着统一,阴阳协调,刚柔并济,共存于一物之中而永葆其生生不已的活力。关于这种“太极思维”的价值取向及其基本哲理,张载用了四句话做出了经典性的表述:“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意思是说,由太极而生两仪,阴阳各成其象,这就产生了相互的对立,有了对立,阴阳的行为必相反而互为仇,但其发展的方向却不是进行一方消灭另一方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而是相反相成,互动互补,最后归本于和谐。和谐的最高境界名之曰太和,大而言之,是宇宙的和谐,天人整体的和谐,全人类的和谐;小而言之,是国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

地区的和谐,家庭的和谐,个人身心的和谐。这种和谐的境界凝聚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历代的中国人奋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因而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激烈冲击和尖锐对立,如何审时度势,执中守正,寻求两者之间的互动互补,使之趋向于和谐的理想目标,也就成为太极思维的精义所在。就中国当前对现代化模式的战略选择而言,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就是一个“一物而两体”的张力结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如果只有单向度的自由主义而取消了社会主义,或者只有单向度的社会主义而取消了自由主义,这就犯了《周易》哲学所反复告诫的独阴不生,孤阳不长的大忌。从而破坏了这种模式的张力结构,丧失了中国的特色。尽管这种战略选择充满着风险,在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误区与陷阱,如同走钢丝绳一样,稍一不慎,即跌落一边,但是朱高正先生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我们以《周易》作为重建文化主体意识的基础,掌握其中所蕴含的“太极思维”的精髓,就可以有效地迎接全方位现代化的挑战,悠游从容地为中华民族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思想动向,大致可以归结为“新左派”、“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种思潮。朱高正先生以启蒙哲学家自诩,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对三种思潮的进一步的反思和整合。作为一种积极的回应,必然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但是无论怎样,他的这部书是值得一读的,正如吴大猷先生所说的,“想要了解朱高正这个人,就一定要看他的书”;“关心国家前途的人,也非要看他的书不可”。

目 录

序	余敦康 1
---------	-------

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

——当代菁英阶层的文化意识批判	1
-----------------------	---

超越俾斯麦	14
-------------	----

不是达尔文的错

——《大灭绝》读后	18
-----------------	----

漫谈全方位的阅读经验	23
------------------	----

正视谋略	39
------------	----

古书亲情一线牵	43
---------------	----

千古一帝秦始皇

——重新解读“焚书坑儒”	46
--------------------	----

中国跨世纪的全球战略刍议

——港、台、大陆经济圈形成之后	52
-----------------------	----

坚持一个中国 培养良性互动

——前瞻“江八点”的两岸关系	62
----------------------	----

《易经》占筮的原理与方法	65
--------------------	----

《周易》与中国现代化

——兼以蛊、损、蒙三卦论述现代化的国家理想	72
-----------------------------	----

论儒

——从《周易》古经论证“儒”的本义	92
-------------------------	----

论黑道

——一个法律社会学与国家哲学的新课题	108
--------------------------	-----

人人有贵于己者

- 评《脑内革命》及其顺民哲学 123

改革开放 和平发展

- 悼念“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 137

“台湾意识”的困境与出路

- 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契机 145

从《孟子节文》探讨孟子思想的当代意义

- 兼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176

论“太极思维”

- 《周易》现代化方法论初探 205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意义 235

近现代中国输入西方思潮的经验与教训

- 兼论“重建文化主体意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 262

把握历史机遇 引进台湾人才参与西部大开发

- 向中共中央暨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说帖 291

关于建立“台闽粤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295

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 以利玛窦、莱布尼兹与沃尔夫为例 300

《康德四论》自序 311

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

——当代菁英阶层的文化意识批判

一、导 言

台湾自解严以来的近三年之中,在“民主化”方面虽有起步,其过程却充满着波折、不顺畅,乃至混乱的现象,显示台湾的政治迄今并未步上正轨。笔者认为,政治上的乱象其来有自,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光停留在政治层面的考虑是不足的,亦是浮面的;要正本清源,一定要从文化着手。

笔者曾对哲学投注过相当多的时间,从政之后亦习惯于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当前的政治问题。本文试图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的“存在主义”以及康德的“先验哲学”等几个观点来探讨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问题,并针对台湾当代菁英阶层的文化意识提出初步的批判。

文化主体意识的沦丧与重建,牵涉到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消沉与恢复。近代德国的精神导师费希特(Fichte)在拿破仑所率领的法军打到柏林时所发表的《告德意志国民书》和中国近代革命领袖孙文为救亡图存所发表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皆针对民族重建的问题提出类似的看法:“对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要其站起,重新出发,必须先从恢复这个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着手。”

台湾这四十年来处于偏安的局面,文化上没有任何主体性可言,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也几乎丧失殆尽。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

各方面来看,虽然不断地引进外来的文化,但是在选择上却是完全没有主见,哪一国影响力大,就用哪一国的,囫囵吞枣,杂乱无章,看不出有任何长期规划的用心。这都是因为我们那些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积极参与并发挥影响力的政治菁英怠惰落伍,而知识界的菁英又未能善尽其责的缘故。

任何一个社会,其菁英阶层的文化意识足以影响到国家兴亡的百年大业。以下举德、日两国的例子供参考:

德国哲学家康德总结了法国大革命前夕欧洲哲学思想的成就,他的思想观念直接影响到往后二百年的德国。例如,康德把人的尊严视为至高无上,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尊贵,就在于人是自由的、自律的,从而是有尊严的。维护此自由、自律的“人”乃是规范整个国家生活的基本价值。西德的基本法即采用康德的精神,在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亵渎。”一般人将其译成“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实无法充分表达其本义。盖德文的“unantastbar”一字是引自《圣经》,意为“不可触摸”。人跟上帝所做的约定置放在约柜内,约柜是“神圣不可触摸的”,一旦触摸,必遭天谴。康德即把人的尊严视同人与上帝之间的约定,是“神圣不可触摸的”。

从康德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思想家的看法,是如何具象化到国家基本生活秩序里面,成为国家施政的最高指导原则。迄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从事司法判决时,仍时常援引康德的著述。如此,一个在哲学思想上有高度成就的文化菁英,其看法直接影响到当代(甚至后世)的政治菁英,使得这些政治菁英在制订法律或经营宪政生活的实践过程当中,也会念兹在兹,那么,这个国家必然充满着无限的希望与活力。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也有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兼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福泽谕吉一方面认真引进西方的思想,一方面声嘶力竭地呼吁,要建立现代化的日本,须先培养现代化的国民,而现代化的国民则要具有独立的精神与人格;有独立的国民,方才有独立的国家。福泽氏的思想直接促成明治维新的成就,近代日本的政治菁英多受

其熏陶,对往后日本的发展影响甚大。

反观我们,自民国肇建以来,迄未有一位思想家建立起足可振衰起敝的思想体系,并以其思想对政治发挥长远的影响力,这诚然是我们的遗憾,却也正是我们针对当代菁英阶层的文化意识进行清算、批判的切入点。而我们批判的目的,正在于了解真相、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以超越原有的困境,并重建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

二、个人的人格自觉与民族的文化意识

在处理“个人的人格自觉”这个问题时,笔者想要借助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先从“主体的时间性”开始谈起。

所谓“主体的时间性”即相对于“客体的时间性”而言。依常识判断,人总认为一切事物均存在于时间之中,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也在时间之中进行。但是按照胡塞尔现象学分析的方法,人作为一个认知的主体,并非存立在时间里面,时间乃是由人的主体性所赋予的。譬如:“钟声在响”或“钟声曾响”。“声响”本身是一回事,那是声音本身在客体方面的时间性;至于“我”“听到”钟声在响或“我”“曾听到”钟响那是另一回事,是主体方面的时间性。

“时间性”的意义何在?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时间性是内含于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人里面,是任何一个认知主体所不可或缺的。由于主体的时间性,认知主体得以将杂多的现象世界依序排列,分其先后。主体若是没有时间性,则任何思考的行为皆不可能,任何反省的行为亦不可能,最后导致所有的意识活动皆不可能。

以下我们将从“回顾”和“反省”这两个重要的现象学概念来进一步论述主体的时间性。回到刚刚钟响的问题来做比喻:客体上的“钟在响”与主体上的“我听到钟在响”,其中有事实上的“时差”:即当我“感受到”钟在响时,钟可能已经不响了。我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经由“回溯”而推论出“刚才钟在响”,这种回溯的能力,我们即称之为“回顾”。

“回顾”的概念告诉我们：我们在从事回顾时，无法针对严格意义的“现在”去回顾，只有对“过去”（也许是刚刚流逝的“过去”）才能够回顾；在反省时，也只有对“过去”的事才能够反省。这里的“回顾”纯粹是认知主体的能力，是专属于主体的时间性，与被我们认知的客体毫无关系。关于主体与时间的关系，胡塞尔做了以下的说明：“人作为一个客观的存有，任何人都活在时间里面，但这个时间是一个被限定的时间，是一个被造成的时间，而不是主体的、始原的时间。人作为一个认知的主体，则已不再存立于时间之内，而是由他赋予时间以意义。”

人作为一个认知的主体，除了回顾的能力之外，还有“反省”的能力。反省是经由回顾，针对外在的客观事物所为的有意识的认知活动；更深一层则是对认知主体自身的反省，吾人称之为“自觉”，此亦称为“二度反省”（即针对“反省”再予以“反省”）。在时间上，将“此时自觉”与“彼时自觉”以至时时刻刻的“自觉”贯串起来的即靠“统觉”，亦即“自觉的先验统一性”。主体的自觉乃是经由“统觉”而得以贯串成整体的、一致的，即形成主体之所以为主体的“主体性”。在“主体性”确立之后，每个主体都拥有其自有、独有、固有的历史的能力。我们称之为“主体的历史性”。

根据海德格的说法，只有认知主体才有从主体的时间性发展出主体的历史性的可能。人作为一个认知的主体，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经验和背景，经过回顾与反省，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所独有的“历史”。又，人是一个存有，存有在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时空之中；而人有思维、欲求、计划以及着手施行的能力。因此，每个人的生活均有其独特的历史，每个人也可以经由自己的企图心与努力开发出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内涵。把主体在各个时段的所思、所欲、所求、所为贯串起来，在真实的人生中不断地加以充实、贯彻的能力，即是预设了“主体的历史性”。

由“主体的历史性”可进一步引申出人“内在的我性”。人“内在的我性”是相对于人“外在的我性”而言。某人出生于何时何地，在

何处就学、工作、游历,这是“外在的我性”。“外在的我性”可能是被决定的,是不自由的,但“内在的我性”却可以是很自由的。所谓“你可以限制我身体的自由,但无法限制我思想的自由”。每个人“内在的我性”不同,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的愿望、企图、成败、荣辱、喜怒,每个人真实的人生过程中所发生、接触者皆形成其精神内涵的一部分,这些“内在的我性”积累下来,整体而言即是“人格”。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人格,对此人格予以反省,如何而后能克服人格既有的缺憾,或如何而后能充分地发展或实现固有的才分,即是“人格的自觉”。人格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有其一贯性;一个有自觉的人格,其内在的我性必然更深刻化、多样化和精致化,从而发展出更丰富、更健全、更充实的精神内涵。

我们若将民族视为一个文化创造的整体,则民族与个体之间有许多地方可以相提并论。一个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相当于一个个人人格的觉醒。一个民族跟个人一样,有“主体的时间性”:即一个民族不再像一般的人类生活在时间之中,而是以全民族为主体赋予时间以意义。在此情况下,依据前面的论述,一个民族将“回顾”过去对整个民族有意义的事件或决定,并进而予以“反省”,并对此“反省”再予以“反省”,从而产生民族的自觉。再借着民族“自觉的统一性”,将“此时自觉”与“彼时自觉”贯串起来。此民族“自觉的统一性”即民族文化“主体性”之显现,该文化主体即拥有该民族自有、独有、固有之历史的能力,吾人称之为民族的历史性。

借着民族的历史性,这个民族能够清楚地判别过去的光荣、耻辱,知道有过什么重大的成就或严重的挫败,知道如何合理地规划全民族未来的发展;在此情况下,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文化的单元,也有其“内在的我性”,对此“内在的我性”予以反省、检讨,即一般所谓的“文化主体意识”。

“文化主体意识”即将整个民族“内在的我性”综合起来,对其作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继续保存,不足之处予以加强,欠缺之处加以改进,如此即是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